

中国当代人口问题（九）

张俊杰 主编



目 录

中国城市化进入青春期	1
人口问题与单身意识	8
农村女性外出务工与家庭性别关系的变迁	27
社会保障面对新挑战	43
社区养老助老服务的取向、问题与对策研究	47
我国积极探索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58
我国中西部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	59
中国加入 WTO 后的就业问题与人口发展	70
我国城市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问题研究	81
用最低工资制度维护劳动者权益	90
对性别失衡的忧思	92
对失业监测预警的思考	94
"空巢老人"牵动社会神经	100
高校贫困女大学生生存调查报告	103
承认贫困人口增长	110
婚检危机看政策的适应性	111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	112
农村地区流动与非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防治	120
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矛盾分析	128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141

中国城市化进入青春期

在民权意识尚未觉醒和成型的空白期，城市差不多已经定型了，市民对城市的设想和权益保护是缺席的，只有历史会给大建设时期留下定论。

“15”这个数字对2004年的中国人来说有绝佳的寓意：房地产市场发展15个年头了；如果此时要购房，那么总房款大约会是你年薪的15倍。人们并未意识到高昂房价背后的民权缺失，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披露，民权意识相对城市开发来说有30年的滞后期，2004年，滞后期演进到一半，正好又是一个15年。

吴志强教授是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院长，他在向《新周刊》抛出他的双“S”曲线理论时，并未忘记从城市的角度唤醒人们疲惫的记忆：“一言以蔽之，城市是谁的？是市民的。不是官员的，更不是开发商的。”

双“S”曲线理论形象地描述了一个“盛世危言”的场景：城市的大发展是一个“S”形，它从一个较低的平台启动，然后进入高速发展期，最后趋于缓和定型，进入较高的平台稳定期；民权意识的发展也是一个“S”形，也是由较低的平台觉醒，进入快速觉悟阶段，然后进入较高的平台稳定期。

吴志强教授的研究表明，民权意识的发展较之城市开发建设的发展有30年的滞后性，30年的时间大约也是一个新型城市发展的关键期，这个时候盛行的是大轴线的规划、大广场的建设以及此伏彼起的大拆大建。

也就是说，在民权意识尚未觉醒和成形的空白期，

城市差不多已经定型了，市民对城市的设想和权益保护是缺席的，只有历史会给大建设时期留下定论。

现在，正是民权意识滞后的第 15 年，城市开发建设的关键年限也行进到一半，学者们认为，2003 年诸多拆迁、房产纠纷案件的发生，正从普适角度反映了民权的缺席。在央视《今日说法》节目 2003 年的年终盘点“年度十大说法”中，涉及到房地产法规、维权与个案的事件就占了三席。

被房地产套牢的中国人，将 2003 年称之为“拆迁维权年”。

谁的城市？

城市化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一个不断增高的亚洲戴着“通俗城市”的面具在舞蹈，这既是一场伟大的实验，同时也不乏痛苦的感觉。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青春期”。

有学者表示，回顾中国城市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体现的是超强的国家意志，以大广场、宽马路、火柴盒式的建筑为特征，体现的是集权的建筑；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时代的配给制和市场化的商品交易先后出现，在不完全的自由市场和双轨制度下，城市呈现的是胶着的状态，在集权与市场之间摆渡；而第三个阶段则以 2003 年为原点，在居住利益上爆发的维权事件，以及对城市规划的空前关注，可以看作是民权意识的觉醒，这使得房地产市场回归到市民本体成为可能。

在城市化的游戏规则中，开发商是重要的一个角色，学者丁东为此总结出“四方博弈”的结论：“城市开发建设是四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官方、开发商、民间再加上

传媒及公共知识分子构成了博弈的四方。”

在四股力量中，官方是各方的调适平衡者；媒体则是监督者和评判者，但媒体本身有自己的多重特性，作为多方博弈的一个平台，一方面受官方舆论导向的左右，还要接受开发商的广告，另一方面要为百姓代言，传递知识分子的民间话语。故此，媒体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第四种力量却被削弱了。而民间的力量因为缺少与官方和开发商等利益集团对话的途径在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剩下来的事情，只是两方博弈，演变成官方和开发商的“二人转”。

民间和传媒的两股势力虽正在觉醒，但远未形成气候，未建构起有效的制衡平台。在城市化的共谋中的缺失，被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认作是“自身的尴尬”。

自身的尴尬来源于著名的“囚徒困境”。在四方博弈中，民间力量/代言者显然具有与对方阵营官员/开发商的信息不对称，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共谋城市”还是“放弃城市”就成为一个悖论。共谋城市是集体理性在起作用，而放弃城市是个体理性在起作用，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较量中，显然，放弃城市所付出的代价最少。居住在北京的丁东干脆直言：“我们越来越不喜欢北京了。”

但城市有它的合谋者，在广州做过楼市记者的董海斌到北京后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两年后，他成为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战略中心总经理。业界传来消息证实，最近，他出任公司在北京顺义区开发的某大型楼盘项目的总经理。

房地产在中国吸纳了无数资金和人才的涌入，像董海斌这样投身其中的并不在少数，他的主要工作是与政

府主管部门、银行和媒体“打交道”，这使他在朋友们面前常常显得精疲力竭，作为既得利益的一方，他扮演着“开发商”这样的角色。尽管迄今他并未购买私人住宅，但这是他的城市。

张宝全则是北京知名开发商，曾以“会吃的房子”的装置艺术而名噪上一届深圳住交会，在北京开发商队伍中，他是公认的将房地产与文化形态结合得最好的人。他透露苦衷说：“开发商只有1/10的时间用来考虑怎样盖房子，9/10的时间都是用来协调各种关系、办理各种手续、跑各个部门。”他表示，如果开发商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建筑本体的营造，那将会诞生好的城市建筑，而不是相反。

民众的“地”位

当房地产行业以“居住改变中国”的姿态进入大众的体验空间时，这个行业的“影响力”就开始爆发了。

环境艺术家米丘认为，城市化发展及房地产行业的辐射力和影响面已经使之左右着民众的生态。米丘表示，几乎所有的城市人、所有的行业都在谈论或是“直接进入”房地产，这是一个特别特殊的现象，这种规模、这种速度、这种集中释放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社会也未曾出现过。米丘能感受到房地产行业所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开发商找他“直接进入”房地产创意和设计领域，这在前几年则是没有的。

每个人都变得与房地产行业有关，政府成了“地主”，房地产开发商成了城市运营商，市民成为业主，艺术家成为商用的环境艺术家。

“人人都在谈论房地产！”一位艺术评论家有所感叹地说，凡是吃饭聚到一起，好像永恒的话题就是房子、

房子、房子。

北京大学一位中年女教师在餐桌上给朋友传授她的“生意经”：她在清华大学附近交首付款买了一处房产，然而将新房装修布置后租给韩国的两个留学生住。

业主杨先生在杭州拥有一处两居室的房子，又在上海购得了一处，他每个月的开支有一半投入到付房款的月供上，在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工作前，他不得不选择“炒更”。

城市的民众被迫选择了过一种“压力”下的生活，最大的压力就来源于“住房”问题，“你吃了吗”的问候语被快速切换成“你买房了吗”的语境。“安居乐业”的田园式图景在都市里很难看到，大多数人是在职场上奋斗和打拼，尤其是在京、沪、广等一线城市，居住成为“大不易”的事情。

除了楼盘的售价让一般民众身受“供楼”之苦外，房屋的质量也是一大问题。在北京楼市记者圈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买房子都是坑（陷阱），只不过有的坑大，有的坑小，就看你跳不跳。这句话起因于一位做过十年楼市报道的资深记者，以他的经验和判断，在买房时也遭遇到一件令他难堪的事：交房的时候他发现，买的单元房内竟然没有下水通道。

越来越多的拆迁、物业、房屋买卖纠纷事件的发生是有其原因的，一方面人们维权意识和居住要求在提高，从简单的受众变成了参与者和市场主导者；另一方面，城市发展和房地产行业模式进入了一个相对固定和成型的阶段，而人们对这个过早形成的现状是不满的。

尽管人们在为房地产现状的不满而喋喋不休，但同时，却又因购买了某种代表生活方式的楼盘而沾沾自喜。

这就是民众的地位，虽然不能“我们的地盘我们做主”，但是作为消费者的苦辣酸甜都领略过。

即便是买到了称心如意的房子，就意味着一切 OK 么？实际上你只有 70 年的产权。学者朱学勤表示，他在伦敦见到过一张为期 999 年产权的房契，他感到无比震撼，一个只有 70 年产权期限的城市发展如何能与之相提并论？房地产只有 70 年的命脉，这意味着，城市化的发展，将会以 70 年为一个周期轮番上演拆迁与建设的工地游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忽视了一个城市的历史传承和悠久根基。

知识界的发难

对于城市的开发建设，文化学者朱大可也有他的哲学思考：“实际上中国多数城市建设都是权力、资本角力、合作和妥协的场所。权力美学以高、大、全的美学特征出现，表现在建筑上就是我们高故我们在、我们大故我们在。与国家主义美学相对应的是人本个人美学，我们应该提倡个人美学，以小街区对抗大马路，以人的身高尺度来规划人与建筑的关系。工业主义的哲学就是水泥化，全面覆盖，以水泥颠覆土地。”

以水泥为基本建筑材料的房地产行业显然更加具有商品的属性，商品的特性之一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万科的王石曾经表白说：“超过 15% 的利润我们不赚。”考虑到万科是房地产行业杰出品牌的地位，如果反过来理解，那么房地产行业到底存在多大的利润以及自由度可以依理推之。

具有强大吸附功能的房地产建筑，也许个人所购买的最昂贵的商品，这件商品却决定了个体的生存模式和生活方式。他住在这个商品里面，感受到的也许是另

外一种心境。

一位有过买房经验和入住体验的学者说：“小区草坪设计好了，房间格局是格式化的，你能够做的不过是装饰装修摆摆家具。哪一天，等你搬出去的时候，你存在的所有信息立即归零。就像电脑的格式化或是刷新，留不下你的任何痕迹。所以说，现代人没有‘家’，只有‘公寓’；不是归宿地，而是暂住地。不像以前的老家，等几十年过后回去，还能找到自己的过去。工业时代的人们更有理由怀念旧的民居。”

城市的景观和风貌正是由建筑支撑起来的庞大体系。然而，“千城一面”的局面的形成正是与大量建筑的毫无生气、严重雷同、大量批发有关。

法国著名艺术策展人侯翰如对此有一个很好的注解，他说，亚洲城市等于拼凑城市，规划跟着建设走。侯翰如认为，一个城市的活力并不在于规划的合理性，而在于解决紧急问题的能力。就该问题他曾于去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策划名为“紧急地带”的艺术展。同样不满的还有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近期在广州南沙举行的一个业界论坛上，有学者发问：“贪污犯罪会判刑，劣质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是不是犯罪？该判多少年？”

广州市规划局副局长李红卫在一番难言之隐的解释后，为难地告诉大家：“规划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从规划到实施一般要5到10年的过程，中间变数太大。”以广州为例，李红卫说目前的状况并非当时的规划和初衷。变数来源于哪里？官员的更替、资金的压力等等因素都是导致城市废墟化的制度原因。

从城市化的游戏规则来看，无法去指责某一个阶层或群体，每个人都可以从利益的角度去看城市化，但关

键是，要在一个多方博弈的规则下去探讨问题。

最差的博弈情形是官、商之间的“对弈”，把城市居民利益放置在一边。以南沙为例，爱国实业家霍英东先生原本有把南沙建成粤港“9+2”重镇的筹划，但一直遭遇时任番禺区委书记梁柏楠的“卡位”，致使霍先生建设家乡的良好意愿屡屡被扭曲。

房地产套牢中国人，这确乎是一个让人“抓狂”的命题：一方面是中国城市建设“青春期”的到来，举世无匹的城市化进程和房地产建设热火朝天；另一方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大量复制使不断膨胀的城市同步感受到不安。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实验”和“痛苦的感觉”在市民心中的双重作用，使得被“套牢”的心态日益彰显。

如果我们以未来的眼光来评判现在的时刻，在2050年回望2004的当下中国，“城市大跃进”式的房地产建设将留下什么是个巨大的问号：留下的是GDP的一些贡献值，是开发商的利润，还是几十年挥之不去的遗憾？可惜的是，这种荒谬感在几十年后才会被人们普遍体会到。

我们期待着，进入双“S”曲线中后期的多方博弈，随着民权意识的觉醒和新鲜势力的加入，进入良性博弈——专家提醒说，只要博弈的任何一方使坏力，结果就不会好。

人口问题与单身意识

主流社会对单身个体和群落的容忍有某些原因，其

中一个原因就是人类生存环境的窘迫造成现代人对人口爆炸的恐惧。

2000年，世界人口已经超过60亿。197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世界环境规划议题，当年的环境规划主题是：“只有一个地球”。而1999年提出：“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从“只有一个地球”到“拯救地球”，我们可以看出，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

“拯救地球”的呼吁反映了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灾难性。

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紧密交缠，像两个恶毒的符咒。1950年之前，人类达到17亿用了数千年，而50年之后，人类人口翻三番只用了50年，人口增长形成的资源缺乏和资源的破坏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重大问题。

发达国家耕地负增长，森林草地正增长（不断植树造林，种植草皮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耕地面积高增长（为了满足增长的粮食需求而毁林造田），森林草地负增长（砍伐森林开垦耕地，滥用木材，过度放养、过度砍伐造成荒漠化，草地面积缩小）。资源消耗的46%归于人口增长，54%归于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就是说，人类对世界的掠夺性开发一半是出于人口增长的压力，剩下的一半才有可能用于人类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

高增长率的人口以及50亿的人口基数已经成了人类发展的瓶颈。

传统的观点认为放弃生育就是放弃了责任和义务，一些传统社会学者曾经就此认为单身者不要家庭子女就是放弃社会责任。从上述人口和资源的矛盾来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观点早已经过时。新时期的观点是自觉

地节育、少生才是对人类负责的表现。二战后发达国家的人口控制很有远见，符合保护地球资源的人口发展策略；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失控则是人口政策失败的表现。无限增长的人口已经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就业、教育、生活保障等社会问题的困境。

采访中有一位未婚中年单身女性忿忿不平地说：“总是说我们不结婚就是不愿意尽社会责任，我们不知道他们（主流意识）所说的社会责任是指的什么。难道就是非得生几个孩子，然后养大，和其他的孩子去竞争上学和就业的份额？难道这样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不然就不是？难道我们参加工作30年为国家所作的贡献就一文不值？就不如那些低智商女人生几个儿子？”

绝大多数单身者都倡导一种绝育的生活方式，当然，他们选择绝育大多是为了个性自由的目的，他们认为家庭和子女是对个人最大的拖累，是个性自由的最大负担，个体解放的最大障碍。曾经被传统主流文化认定是一种自私的利己主义的观念，但是放在今天世界人口大爆炸的背景中来看就不再是自私的和不负责任的了。抑制人口增长，有计划地实行节制生育，于人类的生存状况已是刻不容缓的一项决策。单身者的生活态度结果上是完全可以被当前主流社会所接受的，所以单身者的不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一种利他性的选择。

中国城市布局与人口高密度社会

本项研究的最初目标是探索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形成人口高密度的城市社会和社区。正当我们进行这一研究时，2003年春季，SARS流疫突然袭击了北京、广州、香港等人口

高度密集的超大型城市。SARS 的打击警告中国，人口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是有很大大风险的。这就使中国处在腹背受敌的困难境地。一方面，不能不推进城市化，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指标，使中国从农村人口为主的社会向城市人口为主的社会转型。另一方面，城市化的结果，形成人口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人口在城市地区的高度集中却又带来巨大风险。因此，我们一方面研究中国城市化的趋势，另一方面研究在人口的高度密集的城市里，应采取什么样的组织管理模式、生活方式以应对突发事件、应对危害生命安全事件的打击，从而避免重大社会风险。

一、中国人口高密度居住难以避免

中国人口在本世纪将达到高峰，低的估计是突破 16 亿人，也有更高的估计，如此巨大的数字确实惊人。据研究，夏、商、周时期，中国人口仅仅 1 千万多一点。从汉代直到隋朝，人口总数上升到平均约 6 千万左右。唐宋时期人口的平均数约为 8 千万。到了明朝，平均人口开始突破 1 亿 1 千万人，有人认为，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就与人口过度膨胀有关。清朝以后，中国人口超过 3 亿人，并且持续增长，现在已经将近 13 亿，而且还在继续上升。2001-2003 年以来，中国每年净增长人口下降到低于 1 千万，但仍有约 8 百万人之多。根据人口模型的预测，中国人口的高峰期，在 2035 年至 2040 年间，将达到 16 亿以上。我们知道，因为人口的剧增，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就遇到诸多潜伏的危机和威胁。按照宋健先生的说法，这块土地上的适度人口是 7 亿人左右，这样，我们已经大大超过了适度人口的指标。巨大的人口压力使我们在城市化的建设上，不能不采取高度密集

的居住方式。比如，城市人口的多数只能居住在多层楼房、甚至高层塔楼的单元住房，而不可能居住在占地面积较大的平房、独立建筑或少层楼房里面。

传统上我们爱说中国地大物博，中国的总面积的确不小，但是，可以生活居住的面积却又不是很多。尤其是中国的西北省份，“年平均降水只有 150 毫米至 550 毫米，而蒸发量却数倍于此。地表水源，多是盐碱苦水，饮用和灌溉都不宜。多数地方只能靠天吃饭，人畜饮水都有困难。联合国于 1971 年在东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国际沙漠化会议规定，干旱区人口的临界指标每平方公里 7 人，半干旱区为 20 人。我国西北各省区作为干旱、半干旱地区，其人口密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这种临界值了，甘肃 55 人，宁夏 68 人，新疆 9 人，青海 5.8 人。”

“一个地方人口的多少和经济开发的状况，并不是我们主观上可以随意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该地区的客观自然条件。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我们过于强调开垦、开荒、开发，强调变荒山为梯田，强调向荒山、荒地要良田，强调以粮为纲，其结果是破坏了生态的平衡，大大减少了雨水的径流量，出现河流干枯、湿地减少、土地沙化严重的局面。结果，西部的条件不是更好，而是更为恶化了。所以，中国的西部地区虽然面积很大，但对于其巨大的人口并没有容纳能力。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在西部地区采取退耕还林、退耕还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自古以来，人口比较多地、密度比较高地居住在东部地区，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一种合理的自然选择。所以，中国可以居住的区域是比较有限的。而在这些有限的可居住区域里，人口的密度自然就会比较

高一些。

中国城市的人口居住密度逐年攀升，1990年中国城市人口每平方公里平均有279人，1995年为322人，2000年上升到442人，2001年攀升到588人，2002年则已达到754人。相应，中国各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几乎是按照同样的速度上升的。

近年来，中国大型城市扩张和发展的速度十分惊人。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到1993年仅有68个，而到2002年底骤增至450个，而1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到2002年底已增至171个。

另一方面，仅从中国的城市定义与世界各国城市定义的差别看，也可以体会出，中国城市的人口规模大大高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我们知道，世界上多数国家是根据人口数量定义城市的，低的如丹麦，规定一个地区居住的人口在250人及以上就是城市了。当然，多数国家定义城市的人数为1000至2000人以上，世界上高的也就是1万人及以上。

而在中国，1993年修正的关于设置市的标准，提出：州（盟、县）设市时，非农业人口不低于6万人，撤镇建市时，非农业人口不低于10万人。可见，中国的城市人口标准大大高于其他国家的城市人口标准。在中央政府批准的660个城市中，400万人口以上的有10个，200-400万的有23个，100-200万的有138个，50万-100万的有279个，20-50万的有171个，20万以下的仅有39个。所以，中国城市的人口规模比世界多数国家要大得多。其实，在中国，几千人以至上万人的村庄都并不罕见，从中折射着中国人口的高聚集程度。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中国城市人口已经比较密集

的情况下，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流动的出路何在呢？

二、流动人口与东南沿海城市

根据近年来的统计，中国流动人口以及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有很大的增长。根据一般的说法，2003年，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总数有大约1亿人。实际上，根据我们2003年组织的采用“挨门挨户列举人数”（total enumeration）方法的研究发现，实际流动人口高于统计数据。在我们调查的几个地点中，实际流动人口总数高出当地登记流动人口总数约18%至40%。所以，全国城市农民工的实际人数可能比统计人数高出约1800万到4000万。至于实际流动人口，考虑到其不仅是农民工，也包括各种流动人口，因此比统计数字高出的就更多了。

数量如此巨大的城市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究竟流到了什么地方？这不仅对于研究流动人口自身有意义，而且对于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布局和趋势也有重要意义。从实践上看，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高密度人口的居住地问题。

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抽样数据，采用系统抽样方法从全国总数据中抽取，抽样比为0.95‰，样本人口为1,180,111人。在这个抽样数据中，全国有将近5,090,632的城市外来人口，占全国外来人口总数过半。这部分人群在区域空间地理分布上有何特点？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人口的空间布局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通过聚类分析，区分出几种不同的城市外来人口吸纳方式，以此理解当前人口分布的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机制。

另外我们从对全国 312 个城市外来人口总量的聚类分析中，综合考察了当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分布特征。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化与中国的人口究竟如何配置和布局，换言之，什么样的人口和城市分布才是合理的。所谓合理，应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必要性，从资源、政治、经济多重角度看，怎样的分布才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第二，可能性，即从人口流动、变化的趋势看，这样的布局是否可能。此角度探讨的是中国人口在地域和城市如何分布，目的在于使城市的发展更具有合理性。下面，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城市外来人口是如何分布的。

1、中国城市外来人口分布的特征

以省际外来人口总数、外来人口中农业户口人数、省际人口流动占总外来人口总的比例及外来人口中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这四个变量，对全国各省市进行六分类的快速聚类。结果，广东为第一类，江苏、浙江为第二类，福建、山东、湖北成为第三类，上海、北京聚成第四类，山西、内蒙、黑龙江、安徽、河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新疆、辽宁、云南、河北成为第五类，天津、吉林、江西、甘肃、海南、宁夏、西藏、陕西、青海聚成第六类。从人数平均值来看，城市吸收农业外来人口能力比较强的几个省区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湖北、福建；同时，上海与北京这两个超大规模直辖市也有着比较强的吸收能力。

以经济动因为主的人口流动，在地域上体现得比较明显。观察省际外来人口比例，第一、二、四类（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为当前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也是省际流动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从农业人口所